



新社会学文丛

# 新古典社会学的 想象力

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美〕伊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i)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新社会学文丛



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 新古典社会学的 想象力

〔美〕伊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i) 等/著  
吕 鹏 刘建洲 王颖曜 闻 翔/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 (美) 塞勒尼等著; 吕鹏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

(新社会学文丛)

ISBN 978 - 7 - 5097 - 1706 - 6

I. ①新… II. ①塞…②吕… III. ①社会主义制度 - 研究  
IV. ①D03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583 号

· 新社会学文丛 ·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著 者 / [美] 伊万·塞勒尼 等

译 者 / 吕 鹏 刘建洲 王颖曜 闻 翔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mailto: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责任校对 / 姜夕芬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75

字 数 / 40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06 - 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文版序言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写就的文章，因而涵盖了我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智识进展。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是我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切。

文集的第一编主要是经验性的，不仅勾勒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勾勒了这些不平等的来源。

第二编是对我在匈牙利所做经验调查的理论反思。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经验上可观察到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三编既包括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没落，我也对社会体制的性质进行了概念上的反思。这一编探索的，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大多数经验数据都来自我的祖国匈牙利；作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我觉得自己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理解得最为透彻。但是，我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位地区问题专家。我将来自匈牙利的资料看作是“个案研究”。我的目的一直是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各种后共产主义政体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在本序言的一开始，我将对自己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做几点评论。

《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一文于1972年首次以英文发表，但是文章所使用的资料却来自20世纪60年代几个不同的问卷调查。

1966年，我开始了与捷尔吉·康纳德（Gregöry Konrád）几乎长达十年的合作。康纳德拥有法语和法国文学学位，却不能（或不想）在中学里谋取一份教职（中学教员是拥有这一学位的人的典型归宿）。他在布达佩斯郊区一个名叫“芝加哥”的贫民窟里做了一阵子社工〔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小说，叫《办案员》（*Case Worker*），正是对那段岁月的一个半自传体性质的描述〕。1966年，他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到匈牙利国家城市规划院工作，而我当时是布达佩斯城市规划所的一名兼职研究人员。1966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们在这两个机构举办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首次见面，其间讨论了我們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我们相见恨晚，会议结束之后，康纳德邀请我加入他的机构开始一起从事研究。我们的第一个项目针对的是布达佩斯和三座省会城市里的新住宅区。1969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以一本专著的形式出版，书的标题是《新住宅区的社会学问题》（*The Sociological Problems of New Housing Estates*）。这部著作作为我们将对住房社会学做出的贡献打下了基础。

在开始调查时，我们预计，这些住宅区的住户主要是工人阶级。虽然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共产主义者，但很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将把质量较高的新住宅分配给工人，毕竟，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应该是工人的国家。十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并非如此。总体上说，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這些新住宅区里的比例，要比他们在我們所调查的城市里的比例更高。为了确认我们完全控制了所有的人口统计变量，我们做了另一项调查。这一次，我们从佩奇（Pécs）和塞格德（Szeged）这两座城市随机抽取样本。这项调查的结果为我们早先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还搜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相关数据，结果都指向同样的方向。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我于1973年在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又写了一本书。但是在当时，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可以将这本书以匈牙利文出版，于是，该书于1983年以《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为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

关于经典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住房问题，《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一文是我当时所能做出的最清晰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陈述。<sup>①</sup> 约翰·雷克斯

---

① 我是在亚诺什·科尔奈于《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所提出的“经典社会主义”一词的意义上使用“经典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

(John Rex) 将韦伯提出的理论应用到对住房建设的分析上，这一点启发了我。按照雷克斯的解读，韦伯提出了一种关于各阶层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被应用于各种市场情境。因此，为什么不将住房市场上各种强势和弱势的战略性位置界定为“住房阶级”呢？于是，我对住房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做了区分。那些位于公共部门顶端的人收到的补贴最多，因此最为强势；而那些位于私有部门底端的人则最为弱势。我还试图用这幅“住房阶级”的图景来反驳有关“职业阶级”的描述；我发现住房体系往往导致社会特权的累积，那些在工作上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在住房体系中也处于有利位置。我还提供了一组“动态分析”，引入了“住房流动性”的概念：我不满足于讨论静态的图景，我想要拍摄动态的“影片”，去追踪住房体系中各种社会群体的运动。顺便提一下，后来我才知道这恰恰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想法一致，他当时正在发展他的“空屋链”（vacancy chains）概念。我只是没有他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无法从数学上建构住房流动的模型。

1971~1972年，我知道我必须发展出一套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但当时我的头脑中仍是一片空白。我后来的两篇文章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于1971年用匈牙利语发表了《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一文。之前我的著作无人提出异议，这一次却第一次引起别人对我文章的不满。《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再也无法以匈牙利文发表，于是在1981年以英文发表。这两篇文章显示，特权和弱势的累积不仅仅限于住房体系，在整个地域体系之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一个人在这一地域体系中处于何处，意味着这个人可以获得何种公共补助和稀缺资源；不仅仅存在住房阶级，而且存在“聚落区阶级”（classes of settlements），也就是那些居住在边远小乡村的人，他们的穷困程度是城里人的2~3倍。<sup>①</sup>

乍一看，《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像是在说社会主义的经典体系是反城市、亲农村的。但这并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从《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中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一文的主要观点是说，国家社会主义是反基础建设（以及反私人消费）的。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从一项致力于满足人类需要的规划，转变为致力于加速经济增长

<sup>①</sup>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应该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你们对城乡不平等的社会含义非常熟悉。



尤其是工业增长的规划。伴随着“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苏联的领导人开始沉迷于“赶超”西方，因此尽可能多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称的“第一部门”投资，也就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正如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领袖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去吃能下金蛋的鹅。在基础项目上投资，比如建造住房，就如同吃了这样的鹅。因此，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住房方面的基础设施）压到最低限度，而将生产性投资放大到极致。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国的“大跃进”当然也是最为戏剧性的情节之一。

这一目标只有在经济管理体制之下才能实现：这种经济管理体制杜绝了无政府状态的市场和个体消费者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将可以从生产者那里抽取的产品尽可能多地集中到中央计划制定者的手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正在阅读卡尔·波兰尼的著作。我发现，他关于市场、互惠和再分配整合经济的区分很有意义，可以将其应用到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上。

波兰尼用再分配理论来描述有着大型水利工程的古代帝国，比如古代中国。在这些社会中，中央帝国权威从原本可以自治的村落中征收尽可能多的剩余，从而维系它的灌溉系统和防洪设施。如果征收来的剩余多于这类需求的正当需要，古代帝国就会将它们用于“挥霍性”的官僚消耗上。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

苏联式经济体系可以被认为是再分配的一个现代化了的版本。虽然做过这样的暗示，但波兰尼从来没有将他的理论充分应用于对现代经济体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承担这一使命。我将这一体制的现代化了的版本称为“理性再分配”，从而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方法将其与古代帝国的“传统再分配”区别开来。这种区分遵循的是韦伯主义的分析路线：关键性的问题是，那些行使再分配权力的人是以什么为基础来寻求他们行动的合法性的。

《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比《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在分析上更进了一步，它将国家社会主义“区域管理体系”概念化为一个以再分配的形式整合起来的体制。但是关于现代再分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熟，要一直等到《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出版（完成于1974年，1979年才出版）才完成。在这本文集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文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运转的方式做出了最为全面的说明。

以再分配方式整合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论，当时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从富人那里向穷人再分配收入，在社会科学家的头脑中，“再分配”一词天生地就带有特定的含义。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在这上面苦苦挣扎：我的许多西方读者不理解我所论述的要害是什么。事实上，在1973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一书的书稿正在接受 Pergamon 出版社的审读。评审是一位英国新左派城市规划者，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讨厌我的书，以为我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于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都没有被出版。

文集中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我在离开匈牙利之后写的，目的是明确区分市场经济中的福利再分配和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性质。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1978年完成）一文中，我试图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澄清福利再分配和再分配整合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这篇文章中，我开始对实际存在的“混合”经济从概念上做出界定。这并没有太偏离我早期的著作。毕竟，在论述住房体系的论文中，我已经提到了两个部门：回想起来，其中一个我应该称之为再分配部门，另一个则是市场部门。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对“两个部门”的思想（一个是支配性的，另一个是从属性的）做充分发展，直到1978年的这篇文章发表。到了1978年，我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经济体从本质来说都是混合型的，因此其主导性整合模式的“失灵”必然将被某种次级机制补充。这一洞见使得我能够在这两篇论文中尖锐地指出这样的问题：在市场整合的经济体中，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中产生的，而从属性的再分配机制将纠正这些不平等；在再分配经济体中，不平等是由再分配产生的，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借助市场来弥补他们的劣势。

这两种体制互为镜像（这是戴维·斯塔克后来创造的一个概念）。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再分配的功能与它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相反。尽管我做出了努力，但是我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和《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策》（1987年完成）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亚诺什·科尔奈首先注意到了我的观点。当他试图详细说明《短缺经济学》一书在宏观经济上的后果时（该书完成于1980年，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引入了“多种协调形式”这一思想。他考虑了我提出的将社会主义经济描述为一种以再分配形式整合起来的体系的命题，但拒绝了它；相反，在他于1984年写就的开创性的《官僚和市场协调》一文中，



他将其称为“官僚”协调的体系。

科尔奈的顾虑是人们会将再分配这一概念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这一顾虑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他选择了一种不合适的解决方式。他所提出的“官僚协调”这一概念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是什么的信息，而只是含混地提到了国家如何做事，而这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什么特别之处。毕竟，韦伯将官僚制称为法理型权威最为纯粹的类型：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官僚特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威廉姆森将其称为“科层制”以与市场相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始终对科尔奈抱有感激之情，因为他（重新）发现了，经典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其他体制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并不仅仅在于产权关系，更在于经济整合的性质，或者说，经济协调的性质（这是一个与经济整合一样棒的词）。顺便提一下，这为解读21世纪中国经济的性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科尔奈在他晚期的著作中倾向于相信，一种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选择了市场，那么就会导致私有产权，而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合法性的共产党的政治主导权就会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释放出了大量的市场能量，而且也为私有产权创造了空间；但是共产党的作用仍然没有受到削弱。所以，虽然我在自己的许多论著中都将中国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体制，但中国的情况很明显地表明，经济整合的制度、产权关系和政治权威的性质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整合和私有产权能够于此共存共荣。

但是直到倪志伟于1988年发表那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的精彩文章之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这一提法才开始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倪志伟拓展了我关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论。我当时并没有也未能提出一套转型理论——我所研究的经济体当时并未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转型。倪志伟把我的论点推向了它的逻辑性结论，甚或超越了它的真正含义。倪志伟采纳了我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以再分配方式整合起来的经济中，那些因支配性的整合形式而处于劣势的人可以从市场那里获得补偿。倪志伟的结论是，在转型期间，市场制造了更多的平等，而再分配者实际上是转型中的输家。伴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再分配经济的理念被广为接受，尽管倪志伟关于转型意义的结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理应如此）。这篇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出色地捕捉到了市场转型在早期的一些矛盾之处。就像在中国一样，在中欧，在博弈的最初阶段，某些市场力量得以释放出

来（比如，小农被允许在价格受到管制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某些小商品生产者开始比官员挣得更多，而可以理解的是，这惹恼了一些干部。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一文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中，我报告了类似的发现。我相信倪志伟和我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辨识出了转型早期阶段的一种重要的张力。但是在那篇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里，倪志伟暗示得更多：它被解读为暗指干部们会成为转型的输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不平等程度将低于再分配经济时的水平。

不过，倪志伟的后一部分观点尤其与我的主张相抵触。在我早先的许多文章中，我都坚持认为，我并没有说市场经济比再分配经济更平等。我唯一的只是展示，再分配经济有它自己的不平等，而我们不能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那样，将这种不平等解释成市场力量的残余。恰恰相反，至少在工资和奖金方面，再分配经济产生的不平等往往更低，基尼系数更小。由于掌权者分配了附带性的福利，不平等程度自然会有所提高，但也几乎从未达到过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程度。

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不仅将市场力量看作是解放的力量，而且会带来平等化的效应。他们说得很道理：当古典（封建）等级的特权被非人身依附性的市场力量逐渐瓦解之后，早先的一些不平等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不过，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普世的和平等的原则之上，它也从未像我们所知的封建主义那样僵化和不平等。“封建—社会主义”（feudal-socialism）这一术语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但却始终不怎么准确。

我试图从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出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性质的结论，而这构成了本文集第二编的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1982年）是对我与康纳德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简短综述。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所试图发展的阶级理论是我著作中问题最多的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文捕捉到了这一议题的复杂性，是对我早期关于阶级理论的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本文集这一编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理论上的洞见，即使在今天，它们在经验上的意义也仍然没有改变。

让我从我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开始。我们确实很难将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一

种“无阶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是再生的，不仅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代相传。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极不平衡，而这些不平衡又与经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到底是政治权力不平衡导致经济不平等还是相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试图用阶级分析来回答这类问题是很困难的）。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直接生产者”对他们劳动产品的处置权并不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多。因此，如果人们可以根据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剩余”的体制出发来界定阶级关系的话，人们也应该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界定阶级支配和剥削。这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的理论出发点。

在这一问题上，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推理方式结合在一起，而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理论综合。我的第一个要点来自马克思，也就是说，谁对剩余拥有处置权；但我的第二个要点则来自韦伯，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虽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产权赋予了剥削以合法性，但是在一种再分配体制下，做到这一点的，是再分配者的“目的性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央计划制定者宣称，他们比一般人更知道什么更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这种“目的性知识”得以落实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知识界的“阶级权力”；因此，从定义上说，知识分子指的就是这样一些社会行动者：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这样的“目的性知识”，并因此宣称他们拥有社会权力和特权。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对上述主张从历史角度出发做了明确的说明。这是一个关于“胚胎状态的阶级”，而不是关于实际存在的阶级的理论。这是一个借口吗？几乎不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都绝少宣称它们所辨识出的阶级是固化的。20 世纪 70 年代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汤普森就曾宣称“阶级是一个事件”。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中，我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胚胎状态”的知识阶层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于是，我没有选择“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的理论，而是直接与吉拉斯的官僚集团理论进行交锋。我特别明确地指出，在斯大林主义下，反智主义是非常强劲的，其统治也确实是官僚化的——尽管我质疑官僚们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从而更倾向于将他们称为统治集

团（我觉得这非常准确）。在卡里斯玛型领袖逝世之后，这些政权才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而它们找到的，在苏联和东欧是科学，在中国则是现代化。这就是我所声称的“对专家治国的开放”。这种开放针对的不仅仅是管理—技术专家精英，从广义上说，针对的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我在好几篇文章里称之为“文化资产者”）。这些人尊重知识，对理性的秩序心怀向往。

在我的自我批评中，我承认，这一阶层仍然处于“胚胎状态”，从没有实际存在过。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是，官僚“集团”佯装对专家治国论以及知识分子做出阶级妥协，但最终却不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而是转而安抚农民工甚至工人阶级。正如我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一文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中更明确地承认的那样，最终出炉的新阶级并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而是一个由“小资产者”组成的阶级。

我仍然坚持认为，建立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呼吁确实曾经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而不是仅仅吸引了那些信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1968年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民主德国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我还假设，中国的改革运动在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那里拥有非常广泛的支持基础。

我关于阶级理论的论著也具有一些现实上的意义。当社会开始发出理性主义的呼声时，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往往会非常强烈地支持建立一个有着理性承诺的社会秩序。这不仅是因为实现这一承诺的手段是理性的，而且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结束“市场的无序”。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一直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怀有不满。这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这一带有反讽性暗示的术语被创造出来的原因。

“Bildung”在德语中是“文化”的意思，而“Bürger”指的是资产阶级。那些创造这一术语的人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看上去很荒谬。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能同时还是资产阶级呢？如果东欧的改革确实吸引了受教育阶层的注意的话（我觉得中国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这些文化人不要无政府状态，对新富起来的人甚至过去的有钱人都抱着不屑的态度，这些人虽然声称拥有权力和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但却无法用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以及教育文凭）来证明这些权力和特权的正当性。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东欧的知识阶层开始对执政的官僚集团感到失望，开始相信他们分享权力的承诺只是“水中花镜中月”，于是知识阶层

最终开始走上异议的道路。到 1989 ~ 1991 年共产主义体制没落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文化资产者和受教育阶层，而他们的规划已不再是将社会主义理性化，而是“打造资本主义”。事实上，1989 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就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领导这场革命的就是（由受教育阶层，亦即文化资产者组成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

这构成了我和康纳德合著的《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1991 年）一文的主要灵感（这是我和他一起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文的主题。毕竟，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主义企业家》中，我对知识阶层的议题做了草率的批判；知识分子最终夺取了权力，但使用的方式却与我们早前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预测的方式不大相同。我于 1998 年写就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该书于 2008 年刚刚出版了中文版）中记录下了我这趟心灵之旅的最后心得（至少在目前为止我是这么想的）。在那本书里我总结到，知识分子始终是革命性的力量（真正的革命驱动力并不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而是文化资本），但是所有的新阶级理论（包括我自己的）都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假定：那些在推翻前政权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可以长期地保有他们的阶级权力。

《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1988 年）一文和我的《新阶级理论》（2004 年）一书，是对各种新阶级理论兴衰的一种多少带有反讽意味的评论。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虽然新阶级从未成功地长期保有他们的阶级权力，但是，知识分子的各个组成部分确实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以取代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这些人包括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先锋”、20 世纪 20 ~ 50 年代的技术—管理精英，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技术型和人文型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只不过，他们都失败了。布莱尔的“新工党”、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或近期的奥巴马版本是否能够被解读为新的“阶级规划”，尚有待观察，但他们确实动员起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可以认为，与布莱尔和克林顿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小心地寻找第三条道路相比，奥巴马对“希望”和“变化”的呼吁甚至更向前进了一步。

但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了，甚至那些坚持中国仍然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向市场力量和私有产权敞开了大门。在本文集的第三编，我试图解释共产主义体制没落的原因，并且试图发展出一套理论，讨论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1994年）对流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存活的经济体制，而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管用。我们指出，在“粗放型增长”阶段，再分配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确实表现不错，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至少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业方面是如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但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工业能力，苏联打败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军队——纳粹军队——而当时纳粹仍然在对英、法、美的战争中有所斩获。而也正是苏联，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在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一场人造卫星恐慌，他们害怕苏联也许会在技术上超越西方。我们承认，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再分配经济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因为它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型，也就是从一种重工业和军工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转为大众消费社会。但是，它们崩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这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在1929~1933年间，当面对同样的挑战时，市场资本主义几乎崩溃。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09年3月），大众消费引导型的战略增长减速，资本主义正面临同样的严峻危机。如果我的中国批评者是正确的话（我听说在中国有人批判我的著作，指责我草率地将中国称为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确实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成为经验上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带来有活力的增长，可以逐渐转型到“集约型增长”阶段（据我所知，中国正在向高科技领域和世界经济的高效生产部门进军，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它仍然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但这却使中国拥有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潜力无限的国内市场）。

但是《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底线在于，将苏联拖垮的，是各种（国内和国际）力量的联合。国内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肇因。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剥夺了官僚统治集团的话语，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最终造成了合法性危机。<sup>①</sup> 在《社会主义为何失

---

<sup>①</sup> 当“幕僚”们开始怀疑那些占据领导岗位的人是否有能力统治时，合法性问题就出现了；当大众开始寻找可靠的对象来替代现存统治体制的时候，合法性问题就转变成了合法性危机。

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中，我重新回到在《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一文中已经提上议程的主题上：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异议人士在瓦解一个体制中的作用。

但是，我并不想低估国际力量在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中的作用。虽然美国的自由派不会喜欢我下面的主张，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看来，罗纳德·里根之所以确实在共产主义体制垮台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并不是通过他在柏林墙前那声“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堵墙推倒吧”的呼喊，而是通过他的那场“星球大战”豪赌。虽然没有多少美国专家相信“星球大战”在技术上可行，但戈尔巴乔夫却不能承担忽视它所带来的风险。美国的新技术进步可能已经带来了重要的军事意义，而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这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在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危机中挣扎。

那些建基于——或者用戴维·斯塔克的术语来说，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废墟而出现的社会经济体的性质是什么？这正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讨论的主题。

我希望最终能够出版一本以“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多样性”为主题的著作。这本书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我的身边聚集了一帮同事，他们知道谁将先完成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是否会为这一复杂的议题盖棺定论。我相信，我是第一个讨论这一议题的人。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趋同（至少是局部的）持续了数十年之后，伴随着共产主义体制的没落，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趋同当然只是局部的，尤其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短时间模仿之后，中国走上了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农业部门的社会主义转型）。尽管如此，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我甚至敢说，共产主义体制事实上生产出了一种“社会主义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惊人地相似。在这里，让我用亲身经历对这一观点做出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唐纳德·特雷曼（Donald Treiman）以及魏昂德（Andrew Walder）有过合作。我和特雷曼于1993年在东欧做过一次“1989年之后的社会分层”的调查，我们三人试图把这项调查应用到中国。我帮助特雷曼和魏昂德调整他们的调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在此期间，我们多次访问中国，主要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合作。在我



们最后几次访问期间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位中国同事私下里告诉我：“你知道吗，你们三个是非常不同的人。特雷曼就像是一个美国商人，魏昂德就像是一个威严的德国领导，而你，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虽然魏昂德是最为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也比我更了解中国，但是我觉得我能深深地理解中国同事们的大多数反应。我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匈牙利生活了27年，对社会主义生活游刃有余。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中国时，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家一样。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人”。

1989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对作为“自下而上建设资本主义”的东亚社会与“自上而下建设资本主义”的欧洲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我当时相信，我在《社会主义企业家》中所做的分析事实上更适用于中国而不是东欧。在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于农业部门，资本积累始于基层，私营中小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而至少在我完成《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初稿时（1996年左右），国有企业基本上仍未受到触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建造的，转变的动力是集体部门的私有化。但这种转变有两种方式：在俄罗斯，一般是前党政精英和他们的庇护对象盗用公共资源，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但是市场制度的进化却非常缓慢（我称之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而在中欧，市场制度确实有所发展，但是在将公有部门私有化方面，外国投资者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而本土资产阶级却寥若晨星（因此我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这是对社会和制度变迁的一种有趣的描述，但却不是特别准确。尤其对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我们的分析与人们的直觉相差甚大，而且来得很及时。在我们于1993年开展调查之前，主流观点是由匈牙利的艾勒梅·汗基斯（Elemér Hankiss）和波兰的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Jadwiga Staniszkis）所提出的“政治资本主义”理论。这两位出色的学者预测了1988年的趋势，预言通过所谓的“自发私有化”——这一过程在1988年时确实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都发生了——前共产党精英们努力将自己确立为新的“大资产阶级”。但在1989年，这些政权垮台了，自发私有化被一种更为常规的过程取代：比较公开的拍卖（到底有多公开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情）成为私有化过程中的常规部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精英循环或再生产》（1995年）一文中，我们提出的证据显示，在中欧，前政治精英很难有机会成为新的“大资

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都在向下流动；如果前精英中有人获益，他们也往往是前经济精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通常并不是前高级管理人员）。但俄罗斯的情况则多少有所不同，在那里，“政治资本主义”的命题确实更有说服力。

我早期关于走出共产主义体制多重轨迹的理论确实很有意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需要做进一步的精心阐述，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提出更好的术语。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新古典社会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古典社会学家们会假设说，经济体系的逻辑必须与政治权威的性质相吻合。韦伯和马克思都会同意，市场资本主义倾向于与自由、民主共存。韦伯对此持肯定态度；马克思则带着讽刺的态度，对他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主义能够存在的最好外壳。我所称的新古典社会学，也就是对各种市场体制的研究，并不采用这样的假设。对我来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黏糊到了一起是一个经验问题。至少目前来说是如此，但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拥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从而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伊万·塞勒尼

2009年3月17日于纽黑文

（吕鹏译）